

王贵祥 著

中国古代人居理念与建筑原则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王貴祥 著

中国古代人居理念与建筑原则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
國
古
代
人
居
理
念
与
建
筑
原
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人居理念与建筑原则 / 王贵祥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3

ISBN 978-7-112-17674-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古建筑—建筑艺术—中国 IV. ①TU-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35333号

在 2000 多年前的公元前 1 世纪末，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提出“坚固、实用、美观”建筑三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阿尔伯蒂提出建筑艺术美的“和谐”理念。本书希望揭示的是，与古罗马人一样，早在 3000 多年前的上古时期，中国人也提出了与建筑有关的三项基本原则：正德、利用、厚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阿尔伯蒂将维特鲁威三原则，归结为“和谐”十分相似，中国古代建筑三原则的核心是：“惟和”。本书通过大量古代文献原典的史料发掘，从建筑理论与原则的视角，对中国人的建筑三原则及“惟和”理念，做了条分缕析的发掘、分析与阐释。本书还就古代中国人在城市规划思想、园林景观艺术、建筑审美意趣方面的种种观念与思想，以及与西方人平行存在的古代中国人的乌托邦理念，逐一进行了发掘、剖析与阐释。古代中国人对于建筑之外在性的“利用、厚生”，以及建筑营造者之内在性的“正德”方面的辩证思考，对于今天的建筑师、建筑理论工作者、建筑决策者、设计者、建造者，仍然有着某种启示与警示意义。

责任编辑：董苏华 何玮珂

书籍设计：张悟静

责任校对：张 颖 关 健

中国古代人居理念与建筑原则

王贵祥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29 字数：665 千字

2015 年 2 月第一版 201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88.00 元

ISBN 978-7-112-17674-8

(2683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引言 紫陌青山罗廛闈，星分邑里话人居 / 一

第一章 卑宫室，致力于沟洫

第一节 卑宫室，致力于沟洫	七
一、从乾隆御制《万寿山清漪园记》谈起	七
二、卑宫室与自我完善	一二
1. 心－哲学本体－正德	一四
2. 正德与卑宫室	二一
第二节 天人合一与止于至善	二六
一、从“天人合一”谈起	二六
二、中道与止于至善	三〇

第二章 中国古代建筑（为政）三原则

第一节 原则一：正德	三六
一、两种诉求——向外与向内	三六
二、美观与正德——中西建筑观辩异	三九
三、基于符号学的讨论	四四
第二节 原则二：利用	四九
一、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四九
二、至德、圣人与道器之说	五一
三、黼黻无所用，而务在于完坚	五四
四、节用而爱人，利用而省费	五六
第三节 原则三：厚生	五八
一、宫室之制，本以便生	五九
二、时以作事，事以厚生	六一
三、阜财利用，繁殖黎元	六五
四、安得广厦千万间	六八

第三章 三原则的三位一体：惟和

第一节 利用之道，安其身而后动	七一
一、利者义之和	七三
二、礼之用，和为贵	七八
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八一
四、居处就其和，劳佚居其中	八四
第二节 修和于上，阜成于下	八八
一、厚生之道，在于务本而节用	八九
二、生生自庸，各自用其厚生之道	九二
三、风俗醇厚，家室和平	九五
四、厚生之物，永永不极斯功	一〇二
第三节 君子和而不同	一〇六
一、仁者见仁，知者见知	一〇六
二、君子和而不同	一〇八
三、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一一〇

第四章 中道而立、礼乐之制与甘节之吉

第一节 宫室得其度，乐得其节	一一五
一、从心所欲不逾矩——礼乐之制	一一五
1.“甘节之吉”与“从心所欲，不逾矩”	一一五
2.儒家经典与礼乐文化	一一八
3.礼者中也，乐者和也	一二四
二、宫室得其度，乐得其节	一二八
1.宫室中度，衣服中制	一二八
2.民各安其居，乐其宫室	一三三
3.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一三五
第二节 大壮与适形	一四〇
一、从“中道而立”到“大壮与适形”	一四〇
二、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一四二
三、高室近阳，广室多阴，故室适形而止	一四七
四、适而乐者，所养也	一五一



第五章 君子大居正——中正仁和的人居理想

第一节 正德与中正仁和	一五七
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一五七
二、易简之善配至德	一六〇
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一六四
四、中正仁和	一六六
第二节 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	一七一
一、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	一七二
1. 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	一七二
2.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一七五
二、形气之说	一七六
1. 气与中国风水术	一七六
2.《宅经》与古代建筑中的“气”	一七九
三、阴阳和会之气	一八九
1. 阴阳和会之气	一八九
2.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	一九一
第三节 君子大居正	一九三
一、大居正位，以礼退进	一九三
二、儒家礼制化、等级化方位概念	一九六
1. 古代方位与时空观念	一九八
2. 古代方位中的礼敬尊卑	二〇〇

第六章 营邑立城，制里割宅——纲维有序的人居环境

第一节 中国古代城市营建思想	二〇五
一、两种城市规划思想	二〇五
1. 周礼王城“营国”思想	二〇五
2. 管子城市营建思想	二一六
二、“营邑立城，制里割宅”规划理念	二一九
1. 择中论与三套方城	二一九
2. “营邑立城，制里割宅”规划理念	二二三
第二节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二二七
一、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二二七

1. 中国人的居住观	二二八
2. 住宅建筑的基址规模及其等级差异	二四四
二、环列府州，纲维布置	二五三
1. 古代行政区划及府（州）城市的概念演变	二五三
2. 明代的制度重建与城市建设	二五七
3. 府州城市间的距离问题	二六二
4. 城市等级与城池规模	二八〇
结语	二九五

第七章 疏落有致，小中见大——天人洽和的园居思想

引言	二九七
第一节 山川之形，天地之道；生成之理，自然而然	三〇一
一、先秦时期造园活动	三〇一
1. 上古三代造园	三〇一
2. 春秋战国时期造园	三〇二
二、秦汉皇家苑囿与私家园池	三〇三
1. 秦汉皇家大苑囿与大湖池	三〇三
2. 汉代封藩园池与私家园池	三〇五
三、魏晋时期的造园活动	三〇六
1. 魏晋时期园林	三〇六
2. 建康华林园	三〇八
3. 两晋园林余绪	三〇九
四、从“百里为度”到“福地奥区”	三一〇
1. 百里为度式皇家苑囿	三一〇
2. 福地奥区式芳林园池	三一五
第二节 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北邙游	三二一
一、隐身山林与林泉高致	三二一
1. 隐身山林	三二二
2. 林泉高致	三二七
二、曲水流觞	三三五
1. 从暮春祓禊到三月三节	三三五
2. 曲水流觞与逸情山水	三三九
3. 园林景观中的曲水流觞	三四二



第三节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思想	三四六
一、旷如也，奥如也	三四七
1. 旷如奥如（空间）.....	三四七
2. 疏落有致（布置）.....	三五四
3. 曲径通幽（意趣）.....	三五六
4. 小中见大（意境）.....	三五八
5. 巧于因借（手法）.....	三六〇
二、移天缩地在君怀	三六二
1. 壶中天地	三六五
2. 芥子纳须弥	三六七
3. 移天缩地在君怀	三七〇

第八章 乐以风德，文质彬彬——非直为观美的建筑美学

第一节 物以昭德，乐以德风.....	三七三
一、物以昭德，乐以风德	三七五
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三七八
三、尽善尽美，止于至善	三七九
第二节 文质彬彬，绘事后素.....	三八三
一、质与文——形质与文饰	三八三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三八三
2. 德弥盛者文弥缛，充实之谓美	三八六
二、绘事后素与神彩为上	三八八
1. 绘事后素与空间组织	三八八
2. 至敬无文，以素为贵	三九〇
3. 匪染弗丽，匪和弗美	三九三
4. 神采为上，形质次之	三九五
第三节 非直为观美，求真以动人.....	三九六
一、非直为观美	三九六
1. 不以为观乐	三九六
2. 美于观而便于事	三九八
3. 美与秩序	三九九
4. 中国人的非美观	四〇〇
二、美与工巧	四〇一

三、法天贵真，清美华实	四〇四
1.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	四〇五
2. 诗意图美，居清华之地	四〇七

第九章 乐土、净土与小康、大同——中国人的乌托邦

引言	四一五
第一节 乐土与净土——仙与佛的乌托邦世界	四一八
一、方壶胜境，蓬岛瑶台	四一九
1. 从老庄理想到神仙境界	四一九
2. 园林创造中的神仙境界	四二六
二、妙乐、极乐与净土世界	四二九
1. 西方阿弥陀净土世界	四三〇
2. 东方药师佛净琉璃世界	四三二
3. 兜率天弥勒净土世界	四三四
第二节 从小康到大同——孔夫子的理想	四三七
一、从小康到大同——古代中国的人居理想	四三七
1. 乘桴浮于海——孔子的乌托邦	四三七
2. 小康社会的人居观	四三八
3. 大同社会的人居理想	四四〇
二、井田制与“五亩之宅”	四四一
1. 井田制与上古农业乌托邦	四四一
2. “五亩之宅”与孟子的居住理想	四四四

结语 慕正德而利用，思大同以厚生

一、真、坚固与正德	四四八
二、善、实用与利用、厚生	四四九
三、美、非美与清美	四五一

图片来源	四五三
------------	-----

引言

紫陌青山罗廛闈，星分邑里话人居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广阔无垠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先民们在狩猎、游牧、耕种这些最基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之外，为了遮风避雨，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居处环境的营造。远古时代中国人的始祖，曾被称为有巢氏、燧人氏，也正说明了初民们钻木取火、架木为巢的最早生存状态。

《周易·系辞下》中有：“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① 墨子也曾经说过：“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② 正说明了远古初民经历了漫长的巢居、穴居的原始生活，慢慢过渡到开始自主营建用来遮风避雨的屋庐宫室，自觉创造自己日常生活的居处环境的过程。

现存已知的古代中国初民室庐营造的痕迹，在南方地区，至迟可以发现距今7000年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的原始干栏式建筑遗存。而且，在这里甚至还可以发现至今所知最为古老的木质榫卯结构的证据。而在北方地区距今5000至6000年的仰韶遗址，以及距今4000至5000年的半坡遗址，则呈现为由穴居、半穴居向地面室庐过渡的居住模式。无论如何，从这些遗址中可以知道，远古先民们已经开始创造出了最早的聚落式居处空间形式。

现代考古学已经帮助我们发现了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等大约相当于早商，甚至晚夏时代的建筑遗址，从这些早期宫殿建筑遗址中，似乎已经可以感觉到后来数千年中国宫殿建筑空间及组群方式的滥觞，例如似乎有着中轴线对称处理的萌芽，甚至有了最初的回廊式院落空间理念。而在周原遗址发现的周代建筑，则可以看出，中国人习惯的四合院落式空间模式，早在3000年前的周代，就已经显

^① 周易·系辞下。

^② [战国]墨子·墨子·卷1·辞过第六。

得十分成熟。

古代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建城运动，大约是在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间的春秋与战国时代，那时候，各个诸侯国所营建的大大小小的城池，星星点点地分布于九州大地，形成了十分壮观的古代人居景观。现在尚存遗址的，如禹王城、安邑城、燕下都、齐临淄、郑韩故城、古渑池城等，为我们了解那一伟大时代，提供了佐证。

大一统的秦汉王朝，开启了规划与营建大规模京都城市的滥觞，秦始皇统一之初，就开始考虑经营都城：“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①联想到这是发生在距今 2200 多年的事情，如此大规模的建造活动，无论如何，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同样的大规模城市与宫殿建造，发生在仅仅几十年之后的西汉初年，汉高祖七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②在萧何看来，建筑绝非仅仅是一个起居的空间，也是一种象征的符号，统领天下，表率万邦的天子，其宫殿，其都城，都应该具有“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宏大、壮丽与威严。考古学也证明了这一史实，一座汉长安城内外，居然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以及建章宫等多座大规模宫殿。每一座宫殿的占地基址规模，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一座京城，其实就是一座大规模的帝王宅第。

尽管后世帝王宫殿的规模，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膨胀而渐趋缩小，但这样一种帝都与帝宫的营造理念与传统，一直延续了 2000 多年之久。

自秦汉时代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割据一方的诸侯都城渐趋消亡，但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等级化的地方城市渐渐形成。城市的规模大小、城市内的建筑等級高低，不取决于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取决于这座城市在整个国家城市等级系列中的地位。至迟自唐代始，已经大略形成了京城、都城，以及府城、州城、县城，乃至乡镇、村落这样一个等级鲜明的城市分布模式。这样一种模式，到了宋金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除了个别直隶州城之外，府城隶属于天子之京师，州城隶属于地方府衙，县城（京城或府城附郭县除外）隶属于地方州衙。而等级更低的乡镇与村落，则隶属于地方县衙。这种行政等级化的城市模式，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分布与设置的基本模式，也规定了每一座城市的基本定位。每一座城市的基本规模与城市内各种类型建筑的等级设定，大约都是按照其各自所处的等级而实现的。

这显然是世界人居文明史上的一道奇观，在一个广漠无垠的土地上，城市、乡镇、村落，尽管星罗棋布于大地山川之中，其中却暗含着某种内在的关联、统一、节律与契合。尽管没有全国性的统一规划，但是，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小城市、乡镇与村落等聚落形式，都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各守其位地

①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六.

② [东汉]班固.汉书.卷1下.高帝纪第一下.

营造着自己的居处空间，绝少在建筑尺度上与高度上的肆意僭越，或在城池规模上、城内主要类型建筑设定上与高等级城市中同类建筑盲目攀比的例子。显然，这是一种具有内在和谐感与整体统一感的人居理念。

破坏是时有发生的，自项羽火烧咸阳宫开始，历代的征服者、造反者，除了个别较为理智者之外，往往都采取了大规模破坏与摧毁既有城市与村落的做法。继而发生的是新王朝的又一次新的大规模建造活动。明代的建城运动，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无论是蒙古铁骑对金国、西夏的征服，还是元统治者对南宋的扫荡，都代之以大规模的城市破坏。隋唐至两宋辽金时代数百年的大规模营建活动所留存下来的城市、宫殿、佛寺、道观，许多都变成了灰烬。而也许因为城池往往会对入侵者造成某种障碍，元代对前代所建既有城池的摧毁似乎也是最为彻底的。

我们可以透过《元史》中有关河南地区城市的境遇，一窥元初中原地区的城市状况：“今克复之地，悉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师三四县而已。”^①中原大地，原本是北宋王朝的中心地带，府、州、县城星罗棋布，乡镇繁荣，村落富庶。即使遭遇了金人的征服，但金代经营的二百多年中，仍然保持了其基本的城市格局。但是，在金宋之末，这片富庶繁荣的大地，几乎成了荒蛮之所，如此或也可以一窥古代战争的惨烈。

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明代开始的大规模建城运动，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就显得十分重要。希望恢复唐宋旧制的明代统治者，不仅对城市分布进行了仔细的规划，规定了城市的等级与不同等级的城池规模，也完善了城市内各种类型建筑，如衙署、孔庙、学校、城隍、各种祠庙、坛壝等建筑，各自应守的等级规则，而且几乎对所有城池，或进行重建，或对旧有土城用砖石重新加以包砌，从而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明清时代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坚固而壮丽的府、州、县，甚至镇城的城池。要想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城池分布与建造情况，不了解发生在 600 年前的这场全国性的大规模建城运动，是很难厘清其真正的内涵的。

正是在明代城市中，我们注意到了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的内在统一、节律与契合。正如《明史》中所云：“终明之世，为直隶者二：曰京师，曰南京。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东，曰山西，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湖广，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其分统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县千一百三十有八。羁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县六。编里六万九千五百五十有六。而两京都督府分统都指挥使司十有六，行都指挥使司五，曰北平、曰山西、曰陕西、曰四川、曰福建，留守司二。所属卫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五百九十有三，守御千户所三百一十有五。又土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有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蛮夷长官司五。其边陲要地称重镇者凡九：曰辽东，曰蓟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宁夏，曰甘肃，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②

显然，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等级化城市分布格局，及行政化城市隶属关系，大约都是在明初形成的。而明代这种将全国的城市，纳入一个完整而有机的统一整体中，并且将之与国家的军镇边防等事务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考虑，即所谓“环

^① [明]宋濂. 元史. 卷 186. 列传第 73. 张桢传.

^② [清]张廷玉等. 明史. 卷 40. 志第 16. 地理一.

列兵戎，纲维布置”的城市分布理念，或也正是数千年古代中国城市与建筑之内在统一、契合与节律思想的一次理想化的总结与实践。

正是透过明代城市的研究，我们注意到，古代已经出现，而且明代时得以加强的明代府（州）城市，即具有重要管理、经济与战略地位的锁钥城市之间，存在有350里的距离相关性。这样一种相关性，一直延伸到几乎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重要城市之间。从中可以透析出，这是一个多么宏大而复杂的人居环境分布系统，是一个多么理性而睿智的城市分布理念。而这或也正是中华民族之智慧的体现，是我们祖先在自己的居处环境上的大手笔创造。

当然，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伟大中华文明，在人居环境的创造上，在城市空间的经营上，在宫殿、苑囿、佛寺、道观，以及大量建造的住宅的营造上，所表现出来的理智、理想与睿智，远远没有停留在城市这一层面上。

早在上古三代时期的大禹，就提出了最早的有关中国建筑（也包括农业、水利、铸造等生产活动与为政理念）“正德、利用、厚生”三原则。春秋时代的孔子，又将这一思想，发展为了“卑宫室，致力于沟洫”的理念，从而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宫室营造。这一思想的本质，其实是儒家思想中所追求的“止于至善”思想。所谓仁人君子，应该善于内省，应该以控制、约束自己可能的欲望为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宫室的营造上，就是要抑制或约束自己追求宏大、奢侈、华丽的私欲，要以节俭、卑宫室的实际行动，使自己的行为，合乎“止于至善”的标准，从而为他人（对于统治者而言，是为自己的子民），做出行为的表率。无论是卑宫室，还是止于至善，其核心的理念，体现在建筑三原则上，就是“正德”的原则。

而西汉时期的晁错提出的“营邑立城，制里割宅”的城市规划理念与住宅设计理念，其实已经触及古代中国建筑之创造与营建的本质。即中国建筑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纯艺术性创造，或基于功能的纯功利性建造，而是一种以农业为本的传统文明，从历代现实的土地政策出发，以各自所可能拥有的土地范围为基础，加以分割、规划而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建筑创作与营造的本质，是对一块既有土地的合理分割和实用化与空间化的预布置的产物。这一规划理念，不仅特别符合作为农业国家的古代中国的特色，也符合古代中国儒家所追求的从小康到大同的社会理想。

早在孟子那里，就已经出现了“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的理想住宅理念，儒家思想中所建构的周代人的理想农业社会——井田制中，其实也有每家每户可以有“两亩半”宅田，以作为一个普通农家之居住园宅的思想。这说明古代先哲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特别是在以农耕为主要方式，土地资源是最为宝贵的生产与生活资源的时代，能够做到“居者有其屋”的问题。

这样一种糅合了社会理想与人居理想的园宅观念，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被统治阶层加以实验，自北魏、北周到隋代与唐代的均田制中，特别设置了按照人口分配园宅田的制度，以及在园宅田中，除了营造居处庐舍之外，还必须种植一定数量的桑、枣等树木的规定，从而使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理想，或周代井田制理想中，每户有一定面积宅田的乌托邦式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被尝试或实践。

当然，社会不公平是无所不在的，即使是在实行均田制的制度下，居住园宅

基址面积的等级差别，以及园宅内主要门房、厅堂的建筑等级差别，都是不可能消除的，而这种等级差别本身，其实也正是传统中国封建社会所赖以存在与延续的基础。在唐代均田制渐趋衰亡、普通居民的园宅面积更多依赖于土地买卖制度之后的一千多年间，住宅等级的差别仍然深刻地存在着。如我们从清代文献中所观察到的清代八旗官员、军士自一品官阶至六品官阶所规定的宅舍房间标准，就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这种在历史上无所不在的住宅等级制度的痕迹。尽管清代时，由于人口众多，可以用于住宅分配的土地面积日益有限，住宅等级之间的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小，但这种等级差别本身，就是古代中国社会人居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当然，从纯粹建筑学意义上，同样能够发现许多古代人居思想中闪光的东西，例如从审美层面上，从乌托邦式的理想上，从将自己的居处空间，与大自然的美与野趣融合为一的园林理想上，从遁世避俗的归隐思想与城市园林的营造理念上，甚至从建筑物中所内蕴的“天圆地方”与建筑之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上，都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居理念中那些与同时代的欧洲人或其他文明中生活的人们截然不同的熠熠发光的思想与理念。

“紫陌青山罗廛闈，星分邑里话人居”。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遍布全国大原山川的伟大的城市、建筑与园林，创造了无数丰富而典雅的人居环境作品，也留下了无数宝贵的城市、建筑、园林思想与人居理念。通过爬梳历史文献，去发掘这些思想与理念，对这些理念加以分析与解读，无论对于理解我们祖先的城市、建筑与园林创作的灵感来源，还是对于我们为今后创造民族的与时代的新建筑，创造更为美好的人居环境，提供某种有价值、有意义的历史营养，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这或者就是笔者皓首穷经数十载，耗尽心血，却并未懈怠，希望将这本拙书奉献给世人，奉献给读者，特别要奉献给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建设者们的初衷所在。

第一章

卑宫室，致力于沟洫

第一节 卑宫室，致力于沟洫

一、从乾隆御制《万寿山清漪园记》谈起

中国园林史上有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众所周知的是，清代康、雍、乾三帝都是喜欢营造园池之人。北京西部的三山五园，以及伴随了有清一代兴衰史的承德避暑山庄，主要是在康、雍、乾三代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建立起来的。康熙帝营建了北京西郊畅春园与承德避暑山庄，雍正帝营建了圆明园，而乾隆帝则除了继续扩建圆明园与承德避暑山庄外，还独自营造了北京西郊万寿山清漪园。康熙与乾隆先后为承德避暑山庄题写了七十二景，雍正与乾隆也为圆明园题写了四十景。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三座大型皇家园林中，唯独没有乾隆帝为他自己营造的清漪园题写若干景物的记载。除了园名“清漪园”，以及园中主殿勤政殿内的匾额“海涵春育”，及个别景点的名称是由乾隆亲自题写之外，也不见有乾隆为清漪园大事题写园景匾额的历史记载。以乾隆的性格，他一生中仅描写园林的御制诗就有万首之多，也留下了多处园林碑刻，却独不为他自己亲自营造的这样一部园林艺术大作系统地题写景额，这恐怕不是一个百忙无暇的理由可以解释得了的，那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乾隆有一块心病没有解开。我们从乾隆为昆明湖和清漪园所写的两篇文字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昆明湖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开凿的，清漪园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建造完成的。为此，乾隆先后写了两篇文字，一篇是《万寿山昆明湖记》，另一篇是《万寿山清漪园记》。大致记录了乾隆开凿昆明湖和建造

清漪园的理由。先来看一看乾隆御制《万寿山昆明湖记》中的片断：

夫河渠，国家之大事也。浮漕利涉灌田，使涨有受而旱无虞，其在导泄有方而潴蓄不匱乎！是不宜听其淤阏泛滥而不治。因命就瓮山前，芟苇茭之丛杂，浚沙泥之隘塞，江西湖之水，都为一区。经始之时，司事者咸以为新湖之廓与深两倍于旧，踟蹰虑水之不足。及湖成而水通，则汪洋漭沆，较旧倍盛，于是又虑夏秋泛涨或有疏虞。甚哉集事之难，可与乐成者以因循为得计，而古人良法美意，利足及民而中止不究者，皆是也。今之为闸为坝为涵洞，非所以待泛涨乎？非所以济沟塍乎？非所以启闭以时使东南顺轨以浮漕而利涉乎？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则三尺矣。昔之海甸无水田，今则水田日辟矣。顾予不以此矜其能而滋以惧。盖天下事必待一人积思劳虑，亲细务有弗辞，致众议有弗恤，而为之侥幸有成焉，则其所得者必少而所失者亦多矣。此予所重慨夫集事之难也。^①

① [清]朱彝尊，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 84，国朝苑囿·清漪园。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营造昆明湖的起因。乾隆在通篇文字中大谈开凿昆明湖之必要、之困难。从字里行间，似乎可以看出，对于开凿昆明湖这件事情的对与错、利与弊，当时朝廷内外、君臣之间似乎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乾隆似乎在这里要辩解些什么。既然是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为什么乾隆还为这件事情“不以此矜其能”，却反而“滋以惧”，并且为“集事之难”而大为感慨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篇文字《万寿山清漪园记》：

万寿山清漪园成于辛巳，而今始作记者，以建置题额间或缓待而亦有所难于措辞也。夫既建园矣，既题额矣，何所难而措辞？以与我初言有所背，则不能不愧于心。有所言乃若诵吾过而终不能不言者，所谓君子之过。予虽不言，能免天下言乎？盖湖之成以治水，山之名以临湖，既具湖山胜概，能无亭台之点缀？事有相因，文缘质起，而出内帑，给雇直，敦朴素，祛藻饰，一如圆明园旧制，无敢或逾焉。虽然，圆明园后记有云，不肯舍此重费民力建园囿矣，今之清漪园非重建乎？非食言乎？以临湖而易山名，以近水而创园圃，虽云治水，谁其信之？然而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意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萧何所谓无令后世有以加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及忆司马光之言，则又爽然自失。园虽成，过辰而往，逮午而返，未尝度宵，犹初志也，或亦有以谅予矣。^②

② [清]朱彝尊，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 84，国朝苑囿·清漪园。

事隔 11 年之后，乾隆帝再写与清漪园建造有关的事情时，仍然是心事重重。这里提到了几件事情：一是“与我初言有所背”而愧于心；二是“君子之过”，“予虽不言，能免天下言乎”；三是“忆司马光之言，则有爽然自失”。显然，关于建造清漪园之事，乾隆曾经许诺过什么而没有兑现，此其一；乾隆似乎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有“君子之过”，恐天下人议论，此其二；即使乾隆在为自己修建清漪园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之后，又想起了宋人司马光说过的什么话，却“又爽然自失”。说明他没有真正被自己的理由所说服。那么，身为万乘之身的乾隆皇帝，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我们先来看看乾隆曾经有什么“初言”吧。在圆明园建成之后，雍正有一篇